

# 汉语词汇结构论

hanyu cihui jiegou lun

周 荐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 汉语词汇结构论

周荐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词汇结构论/周荐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11  
ISBN 7-5326-1677-0

I. 汉... II. 周... III. 汉语—词汇—研究 IV.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1910 号

**汉语词汇结构论**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92 000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ISBN 7-5326-1677-0/H·235

定价: 28.00 元

# 序

邢福义

周荐君的新著《汉语词汇结构论》即将问世。打开书稿,粗略翻看,立即感觉到了书里浓浓的新意。

凭第一时间获得的印象,最突出的感觉是以下三点。

其一,建构新。

全书共分十三章。光看目录,可以知道,跟经常见到的词汇学著作相比较,本书半数以上的章目是新的。有六章,在别的词汇学著作里可以看到类似的语言片段。即:第一章,“引论”;第二章,“字、语素、词”;第三章,“单纯词的构成”;第四章,“由词根和词缀结构成的合成词——派生词”;第五章,“由词根与词根结构成的合成词——复合词”;第十三章,“惯用语、歇后语、谚语等俗语的结构问题”。另外七章,则凸显出了七个方面的研究专题。即:第六章,“双字格”;第七章,“三字格”;第八章,“四字格”;第九章,“五字及五字以上的组合”;第十章,“合成叠字词语”;第十一章,“特殊格式”;第十二章,“同族词语”。全书的章目布列,表明了作者在建构汉语词汇学系统上有自己的追求,在刷新汉语词汇学著作的面貌上做了可贵的努力。

第二,有己见。

不管章目是似曾相识,还是面貌全新,作者对问题的论说都具有一个特点:讲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比方,第四章里,作者指出:派生词当然是由词根和词缀结构成的,但是对词根之实和词缀之虚的程度把握不一,导致对一些词缀和一部分派生词的认定意

见分歧；虚字与词缀，实字与词根，相互间不一定存在绝对的关联。又比方，第五章里，作者指出：绝大多数复合词的结构关系与其词性呈现着对应关系，少数复合词的结构关系与其词性并不呈现对应关系。又比方，第七章里，作者指出：三字格理论上共有 22 种构成模式，但存在于现代汉语中的只是 16 种模式；三字格是用以负载俚俗文化的，因此所谓的“惯用语”多由三字格充任。再比方，第八章里，作者指出：四字格的形成与《诗经》为代表的雅言和汉魏四言诗有直接的关系；四字格与双字格比较，虽两者都音步平稳、对等联结，但四字格多由 2+2 的方式构成，因而一般应属固定短语；而双字格虽由 1+1 的方式构成，但由于单字多已不再独用，因而它是词的典型模式。再比方，第十一章里，作者指出，“半……不……”“连……带……”“七……八……”“说……道……”等待嵌格式是词汇性特殊单位，而非词汇性的待嵌格式（如“因为……所以……”“即使……也……”“不但……而且……”“或者……或者……”）不宜与词汇性待嵌格式混淆起来；作者又指出，“前首相和大臣”之类的“前”，是一类特殊的词汇单位，可以称之为词加。综观全书，不难得到一个判断：这是一部别出心裁的著作。

### 其三，视野宽阔。

本书研究问题，兼顾了共时和历时。作者以现代汉语为基本观测点，对《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全部词汇单位，从字、词、固定短语的结构和构成等角度进行了穷尽式的描写，分析出了各类汉语词汇在结构上和构成上的特点和规律。作者又把研究视点投向由古至今的时间纵线，对别的学者论著中所提供的甲骨文时期、先秦时期、中古时期、清代末年、20 世纪和近十几年的汉语词汇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对汉语词汇在两三千年的发展史中各个不同时代层面的状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所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不仅如此，作者还以日语、韩语、英语词汇为例，对汉语词汇的历史演变作了旁证式的分析研究。横向描写和纵向分析的结

合,展现了作者研究视野的宽阔,整部著作显得既有厚实感和立体性,又有方法论上的求新感和启示性。

我和周荐君相识,当始于1984年。那一年夏季,承蒙刘叔新兄的邀请,我到南开大学讲学几天。在那里,多次跟周荐君接触,感觉到这是一位肯下苦功的青年学者,将在汉语词汇学研究上有所建树。果然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叶,他开始了一项“笨”工作,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全部条目,凭借一支笔和百十本旧挂历裁成的数万张卡片,对现代汉语词汇进行了穷尽式的统计研究,后来,不停地翻阅《现代汉语词典》,竟翻烂了六本之多。这是极为艰辛的劳作,看起来“笨”,实际上却受益甚多。二十年来,他不断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今天又撰写成了《汉语词汇结构论》,正是常言所谓“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亲眼目睹了周荐君二十年来的“春种秋收”,格外高兴。

目前,我们国家的汉语词汇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总的说来,作为一门学科的汉语词汇学,要真正成型,真正成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怎样通过探索、探索、再探索,从而更上一层楼,就当今我国语言学界的状况而言,固然需要老一辈词汇学家的前导,更需要周荐君这一辈中年词汇学家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我在《“最”义级层的多个体涵量》一文里说过这么一段话:汉语的词汇词义的分析研究,应该同语法语用的分析与研究结合起来。所谓词汇词义,是指词汇系统中一个一个语词的基本含义;所谓语法语用,是指语词在特定语法组合中的实际运用。孤立的词汇词义层面的分析,只能获得最基本的了解;衔接上语法语用的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深入而全面的认识。这种接轨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并非“最”字如此。比方“没”,从词汇词义的角度说,“没”就是“没”,就是零,但从语法语用的角度说,“没”不一定完全没,可能不是零。又如“兄弟”,就加合型用法来说,所有词典都解释为“哥哥和弟弟”。然而,在实际运用中,有时则指“哥哥或弟弟”,有

选择性:他没有一个兄弟。诚然,在特定的语法环境中,在语言的动态应用中,词语的含义往往比词汇角度的解释要丰富得多。(《中国语文》2000年第1期)语法学、语用学和词汇学,各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对象和需求,但是,研究语法和语用时关注一下词汇学的问题,研究词汇时关注一下语法学或语用学的问题,也许会有好处。这个想法不知对不对。如果不对,就把它当作一个学人的习惯性思维吧!

我想起唐人岑参的诗句:“春去秋来不相待,水中月色长不改。”我很喜欢这诗句的意境。沉醉于学问者,总是“痴心人”。周荐君如此;在钻研中寻求乐趣,送走一个个春夏秋冬的学者们,无一例外。我愿意与周荐君一起,共同品味其中的情蕴。

2004年8月10日

# 目 录

序 .....	邢福义 1
<b>第一章 引论</b> .....	1
第一节 作为分析对象的词汇 .....	1
第二节 词汇性单位的确定 .....	14
第三节 词的构成、结构和地位 .....	21
第四节 现代词汇结构论所研究的对象 .....	36
<b>第二章 字 语素 词</b> .....	44
第一节 字和语素 .....	44
第二节 字和词 .....	47
第三节 字串和语素 .....	55
第四节 语素和词素 .....	56
第五节 实语素和虚语素 .....	61
<b>第三章 单纯词的构成</b> .....	63
第一节 单纯词的基础——字 .....	63
第二节 联绵词——连缀成义的词 .....	66
第三节 单纯叠字词 .....	71
第四节 外来词及其译借方式 .....	73
<b>第四章 由词根和词缀结构成的合成词——派生词</b> .....	88
第一节 派生词的构成 .....	88
第二节 简单派生词的结构 .....	91
第三节 复杂派生词的结构 .....	92
<b>第五章 由词根与词根结构成的合成词——复合词</b> .....	95
第一节 复合词的构成 .....	95
第二节 简单复合词的结构 .....	109
第三节 复杂复合词的结构 .....	113
第四节 特殊结构类型的复合词 .....	116



第五节	词构与词性的对应关系 .....	120
<b>第六章</b>	<b>双字格</b> .....	123
第一节	双字格概观 .....	123
第二节	双字格的构成和结构 .....	132
第三节	双字格与成语 .....	160
<b>第七章</b>	<b>三字格</b> .....	163
第一节	三字格概观 .....	163
第二节	三字格的构成和结构 .....	181
第三节	三字格的表义机制 .....	189
第四节	三字格与惯用语 .....	196
第五节	三字格与词 .....	207
<b>第八章</b>	<b>四字格</b> .....	211
第一节	四字格概观 .....	211
第二节	双四字格结构分析 .....	225
第三节	四字格的形成 .....	227
第四节	四字格与成语 .....	230
第五节	四字格和三字格的比较 .....	244
第六节	四字格与词 .....	253
<b>第九章</b>	<b>五字及五字以上的组合</b> .....	258
<b>第十章</b>	<b>合成叠字词语</b> .....	264
<b>第十一章</b>	<b>特殊格式</b> .....	283
第一节	待嵌格式 .....	283
第二节	词加 .....	291
第三节	并列结构内成分的顺序 .....	295
第四节	对称结构 .....	305
第五节	简称、缩略及别称 .....	316
<b>第十二章</b>	<b>同族词语</b> .....	325
<b>第十三章</b>	<b>惯用语、歇后语、谚语等俗语的结构问题</b> .....	330
<b>主要参考文献</b>	.....	336
<b>主要术语一览</b>	.....	346
<b>跋</b>	.....	350

# 第一章

## 引 论

### 第一节 作为分析对象的词汇

语言中的词汇性单位究竟有多少,这是一个比较难于回答的问题。即使是问现代汉语中的词汇性单位到底有多少,要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也非易事。困难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代汉民族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创造新词、新的固定短语,即使经过专家筛选,每年也有数百个之多。<sup>①</sup>当然,一些新词语词典所收的条目是否确实为新词语,也就是说为这些新词语词典立为条目的单位是否确乎未曾在古代出现过,还是值得仔细甄别推敲的。<sup>②</sup>第二,现代汉民族与外界的交往日趋频密,每年因新事物、新概念的引进而出现的外来词语不知凡几,这从国内出版的《参考消息》等及时反映外界信息的窗口性的报刊上可见一斑。这些新的外来词

---

① 参考:于根元主编.1991 汉语新词语;1992 汉语新词语;1993 汉语新词语.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② 国内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出版的新词语词典就有数十部之多,然而一些词典所收的条目并不一定真正是现代人所造,而很可能是古人创造的。比如下面一些词汇单位,就是为一些新词语词典所收而实际上早在古代就已出现过的:“体认”(《无声戏》:“鬼神的聪明,不是显而易见的,须要深心体认一番,方才揣摩得出。”)“胎教”(《连城璧》:“古人原有‘胎教’之说,他那些莺啼燕语之声,柳舞花翻之态,从胞胎里面就教习起了。”)“跳槽”(《连城璧》:“戏已学成,正要出门做生意了,为什么忽然要跳起槽来?”)“人犯”(《施公全案》第 480 回:“天霸命李七侯、何路通等人押着人犯……”)“大老”(宋·无名氏《宣和遗事·新编五代史平话·周史平话》卷上:“公为宗室大老,不向此时善自为计,他日受制于人,悔之何及?”)

语哪些会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中的恒定的单位,哪些只是过眼烟云,尚需时间的检验。第三,国内(包括港澳台)各语言社团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交互影响,汉语方言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对汉民族共同语不容忽视的影响,也使现代使用汉语的人嘴里的词汇单位日益增多。然而,哪些词汇单位仍旧隶属于某个语言社团而尚未进入共同语,哪些词汇单位早已成为了共同语中的恒定性的单位,哪些词汇单位是不久前才进入共同语而还带有方言印迹的成员,却是需要认真审辨的。<sup>①</sup> 第四,现代汉语究竟应从何时算起,迄今还是一个说不大清的事。绝大多数的人主张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算起,但“五四”更主要的是个政治概念;“五四”之前白话文虽然尚未占据统治地位,但在百姓嘴里使用至少已有一二百年却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仅从书面语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重要的报刊,如《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就出现了大量为现代继承下来的词汇单位。<sup>②</sup> 现代汉语的起点说不清,我们就无法把现代汉语的词汇单位与近代汉语的词汇单位科学地分开,现代汉语的词汇单位的数量也就难于得出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第五,现代汉语的起点说不清,诂点同样说不清。“现代”汉语总不能无限期地“现代”下去,有鉴于此,有的刊物已称《当代语言学》《当代文学》,应该说此举反映了一些人的这种认识和忧虑。不过,国内绝大多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学科研人员仍固执地把今日汉民族所使用的汉语称作“现代汉语”,也不无道理,因为:如果汉语发展百年即换一个称谓,那么再过百年汉语岂不又要弃“当代汉语”而改称别的什么汉语不成?这是其一;其二,现代汉语和所谓的当代汉语的界限又在哪里?这样的分别有多少语言事实的

---

① 参考:周荐.论方言词的确定.见:语言研究论丛(四).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② 参考:黄河清,徐文堪,姚德怀.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支持,又有多少人为的因素?第六,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现代汉语的词与小于词、大于词的词汇单位的界限在哪里?如何划?词和语素的分别在最近二三十年似乎已为世所公认,词和一些固定性的短语的分野也是明显存在的,不少学者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是客观地说,收效与所花费的劳动并不等值。再进一步看,词和字的分别,词和字串的分别,又如何界定?因为以上的原因,我们说现代汉语的词汇单位的数量究竟如何,是一个比较难于得出完满答案的问题,至少在目前来看还是如此。

在对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词汇的研究中,与其纠葛最为严重的莫过于汉语各个方言的词汇。弄清汉民族共同语词汇和汉语方言词汇的关系,对我们将汉民族共同语词汇的范围确定下来并对其展开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如所周知,我们所谓的现代汉语,即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而所谓现代汉语词汇,则是这种民族共同语中为语法所组织的建筑材料单位。汉民族共同语是历史的产物,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在长时期的发展中形成的结果。民族共同语是与方言相对的概念,与汉民族共同语相对的汉语方言之分歧和复杂,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屈指可数的。我国是一个地域广博、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地域广博、人口众多使汉语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方言歧出的丰富复杂的局面。方言是民族语言在地域上分化的结果,是民族语言在地域上的支派。人是喜欢群居的,群居而成社会,社会乃有语言。人又是善于开拓进取的,因开拓进取而拓土开疆、辗转流徙,由一个母社会分出若干个子社会。山川阻隔无车马可通,时光流逝非人力能挽,子社会的人们所操的语言逐渐显现出与母社会的人们所操语言的不同,是为方言。现代汉语的方言,就是汉语历史演变的结果。方言歧出的局面对于一个统一的民族社会来说是不利的,它不利于人们的交际、交流和沟通,不利于政令的颁行,也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和贸易的往来。因此,从先秦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就为建立并推行一种全民族共用的标准语进行过不懈的努力。记录

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就记载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即雅正的语言，说明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一种规范的标准语而能供世人使用是孔子这样的圣贤的伟大梦想。到了汉代，著名学者扬雄所著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以下简称《方言》）在记录一些地方的方言时使用了“通语”“通名”“四方之通语”这样一些术语，说明在汉代已存在着以中原地区的方言为基础的共同语。大一统的共同语为大一统的社会所呼唤，共同语的形成往往有赖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条件。辽、金、元、明、清五代定都北京，使北京成为了中国政治、经济当然的中心；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名著用北京话为核心的北方方言写就，也标志着北京是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文化无可争议的中心。这一切就是汉民族共同语最终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根本性的原因和决定性的条件。共同语是全民族共同语，共同语的推广当然也要依赖全民族的参与，然而这在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是难以做到的。处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转型期的孔子时代，推广共同语还只是那一时代的先知先觉者的个人行为；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清雍正朝倒是使之过渡成了一种政府行为，在皇帝亲颁的诏书中饬令地方官员“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习为乡音”，但那只是对官员的一种约束和要求，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则微乎其微。人类脱开封建主义的尘封历史而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推广共同语成了一项重要的内容，英国的工业革命是这样，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如此。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在我国先天不足，本应由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在全民族、全社会推广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责任就历史地落在了现代中国人的肩上，要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完成共同语的推广和普及的任务。

在汉民族共同语形成之初，须得有一种为全民族所认同的方言充作它的基础方言，北方方言就众望所归地成为了这种基础方言。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语言成分绝大多数都来自北方方言。在现代的汉民族共同语出现之前的两三千多年前，华夏民族就也曾有过自己

的共同语,那就是上面提到的通语或雅言。自周初开始形成并在那以后的千年左右的时间里逐步完善的通语,也是以某一种方言为其基础方言的,这种方言就是关中方言。作为基础方言,北方方言和关中方言都对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或有过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基础方言之外的方言对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了不可小视的贡献。认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民族共同语只是一种在自然语言基础上加过工的语言形式,如果一种共同语只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而不是博采众方言之长,即不是将其他方言中有用的成分纳入其中,那么这种共同语势必是贫乏的,缺少丰富多彩的表现力和鲜活的生命力的。事实上,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共同语几乎没有一种是只依赖基础方言形成的,而总要从本语言的其他方言甚至其他语言中吸收养分以弥补自身的不足。

汉民族共同语中的一些词语在上古时即已成型,是上古时的通语中的基本单位。这些词语多是由通语赖以建立的基础方言进入到通语中的单位。非基础方言的词语的地位是难以与基础方言的词语的地位相比的。扬雄的《方言》在对当时的一些方言现象进行分析时就反映出重关中方言轻其他方言的观点和倾向,如:“茹,食也。吴越之间凡贪饮食者谓之茹。”汉民族共同语选择了“食”而未选择“茹”,“茹”只保留在从古遗留至今的固定说法“茹毛饮血”等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这个词只用于“吴越之间”。“虔、散,杀也。东齐曰散,青徐淮楚之间曰虔。”“虔”“散”今已不表“杀”义,表“杀”义者仅“杀”耳,原因大概也只能归结于“虔”“散”属方言,不属当时的通语。“食”“杀”之所以保留至今并作为共同语的基干词,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它们都属当时的通语。<sup>①</sup>

---

①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凡当时通语中的词都可保存至今并在共同语中担当重要的角色。《方言》中所记录的关中方言词有些今也不存,如:“差、间、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谓之差,或谓之间,或谓之知。知,通语也。”“知”义为“愈”,是通语的词义,今天却已亡佚。

自周初开始逐渐形成的通语,应以周都所在地的关中方言为标准。尽管周都后来由镐京东迁洛邑,以关中方言作基础形成的通语似乎并未有多大的改变。因此,再以后的春秋时代所出现的百家著作,作者籍贯分属各地,所操语言仍基本上是周初形成的那种通语;即使圣如孔子,也表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记录其言论的《论语》并未有多少齐鲁方言的成分。

古代通语是以某个方言作基础方言的,以基础方言中的词汇单位作为其词汇的基干的。现代的汉民族共同语更是如此。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提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词汇规范标准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那其实就只是对已形成的历史状况的一个总结,最多可以说它对共同语在那以后的发展起到一个指示前景和前途的原则作用。因为早在那原则被制定出来之前的千百年间,我们的一代又一代的先祖正是这样做的,汉民族共同语也正是循此途径一路发展过来的。千百年来汉民族共同语始终是以基础方言的成分作为其构造的根基,非基础方言的方言成分不是主流部分。姑且不说中古时的敦煌写本、宋元话本中使用的那些令今人难以索解的方言词语,即使是明清两代的著名文学作品中也常有需专门家考辨的方言词汇单位,如《金瓶梅词话》中的山东方言词汇单位(“涎缠”“搨混”“猎古调”“戳无路儿”“啻啻磕磕”“迷留摸乱”等<sup>①</sup>),《红楼梦》中的吴方言词汇单位(“滚水”“怪道”“人客”“拆鱼头”等<sup>②</sup>)。那些词汇单位之所以需专门家考辨,原因也正在于它们只属于方言,而且是基础方言之外的方言,并不属于通语,更与现代意义上的普通话无缘。

任何一种民族共同语的形成,都要以某一种方言为其基础方言。但是以某一种方言作基础方言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拒其他方言在共同语形成过程中所可能发生的作用;事实上在共同语形成的

---

① 参考:张远芬.金瓶梅新证.济南:齐鲁书社,1984.

② 参考:晁继周.曹雪芹与高鹗语言的比较.中国语文,1993(3)

过程中往往是基础方言起一种定基调的作用，而另外的诸多方言也为共同语的日臻完善各自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仍以《方言》为例：“速、逞、摇扇，疾也。东齐海岱之间曰速，燕之外鄙、朝鲜洌水之间曰摇扇，楚曰逞。”“摇扇”“逞”的“疾”义虽未作为共同语的成分被保留下来，但“速”却一直使用至今，成为了共同语的基干成员，尽管它的出身并不是作为当时通语的关中方言。“食阎、怱愚，劝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说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谓之食阎，或谓之怱愚。”南楚方言的“食阎”虽未进入通语并因此而流传下来，但“怱愚”却不但进入了通语而且进入了共同语，非关中方言的出身并未阻碍其在通语和共同语中充当一个不能或缺的角色。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固然是以北方方言作基础的，固然是以北方方言的词汇单位作为其词汇的基干的，<sup>①</sup>但是其他对方言对共同语的形成、对共同语词汇的形成的影响更显而易见。普通话中来自非北方方言的词汇单位俯拾即是，如来自吴方言的“龘龘”“垃圾”“拆烂污”“亭子间”，来自粤方言的“靚”“马蹄”“宵夜”“顶呱呱”，来自湘方言的“堂客”“伢子”“红薯”，来自客家方言的“番茄”“水客”，来自闽方言的“妈祖”。共同语的词汇为基础方言之外的方言充实、丰赡的情况是显然的，不足为奇。其实，岂止是基础方言之外的方言可以充实和丰赡共同语，由若干种语言构成的大的语言社团中的众多非基础语言，也对族际交际语的充实和丰赡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境内的普通话就是现代全中华民族的族际交际语，这种族际交际语固然是以汉语为基础语言的，但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也对充实、丰赡普通话的词汇系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就有不少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单位，如像来自蒙古语的“哈达”“那达慕”，来自维吾尔语

---

<sup>①</sup> 这里说的北方话，实际上是大北方话，也就是说它不仅局限于淮河或长江以北的地区，而也包括西南的四川等地的汉语方言。



的“热瓦甫”“肉孜节”，来自朝鲜(韩)语的“阿妈妮”，来自哈萨克语的“冬不拉”。

方言对共同语、其他语言对族际交际语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词汇上，语法的影响也同样存在。如所周知，通语的语法也是以基础方言的形式作根基的，但也很难完全排除其他方言的语法的影响。如疑问代词“何”属于通语的关中方言，但为诸子中一些名家常用而后在某些历史时期中甚至成为了通语的基干成分的“曷”，本非关中方言的语法成分，有的学者认为它属于齐语。<sup>①</sup> 齐语中的语法成分进入了通语，说明方言语法对通语的影响是存在的。再如第一人称代词“余”本来很可能是楚语中的词，楚辞中常用。<sup>②</sup> 这个并非关中方言的语法成分后来不但成为了通语里不可或缺的成分，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中也是诗语、书语表达中必不可少的语法成分。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语法，按照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的说法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这“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实际上仍以北方话为主干。不要说操北京方言的老舍，即使是原籍为浙江的鲁迅、原籍为四川的郭沫若和巴金等，他们写就的作品一般都是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的，因而成为了“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倘若这些名家所使用的尽是自己方言的语法，那么他们写就的作品也就不成其为“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非北方方言区的作家们所写就的作品间或流露出其母语方言的一些形迹，也常被世人视为不规范的现象，如鲁迅作品中出现的“一匹蚊子”之类的说法。这当然是瑕疵，不能以偏概全地将这些作家所用的更具典型意义的语法形式否定掉。而如果方言

① 王海菜。“曷”字琐议，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版)，1981(2)

② 孙良明先生统计了先秦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余”的使用情况，结论是《诗经》和《孟子》中各出现1例，而《楚辞》中却出现94例。(孙良明，古代汉语语法变化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上述统计数字似乎透露给人们一个信息：第一人称代词“余”可能与楚语关系较为密切，或许它本身就是楚方言词。